



大学问

温惠琴◎主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文化素质大讲坛丛书



文
化
素
质
大
讲
坛
从
书

大学问

温惠琴◎主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问/温惠琴主编.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4
(文化素质大讲坛丛书)

ISBN 978 -7 -5361 -3611 -3

I. 大… II. 温… III. 大学生 - 素质教育 IV. G6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6406 号

出版发行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路
	邮政编码: 510500 电话: 87557232
印 刷	湛江南华印务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 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9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 000 册
定 价	43.00 元



- 1 大学的文化和精神/温惠琴

为学与人生

- 6 为学漫谈/陈长琦
- 18 专才与通识——从坐在刀刃上的译员谈起/仲伟合
- 28 语言的精华 为人的准则——谈汉语格言与人生/管林
- 42 就业与人生/黄晓波
- 55 百年留学潮与中西文化交流/周炽成
- 65 时间观与跨文化交际/郑立华
- 79 信息时代的教与学/徐福荫
- 88 中西方生死观之比较/邓晓芒

教育与社会

- 104 科学发展观与当前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吴颖氏
- 118 当代高等教育理念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卢晓中

- 131 中西方公共管理改革比较/刘志光
- 142 当代国际法律秩序与中国/袁古洁
- 157 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宗教背景/赵林
- 171 漫谈生态旅游资源与开发/徐颂军
- 186 传统、时尚和野生动物的保护/江海声
- 197 漫谈逻辑/张家龙
- 209 当代艺术与艺术批评/皮道坚
- 223 创立品牌，走向世界/朱志昌

历史与文化

- 236 什么是国学/魏达纯
- 246 荣辱观——一个古老而常新的时代话题/林伟健
- 262 老庄道家的人文价值/冯达文
- 277 《周易》——巫术里孕育的大智慧/吴辛丑
- 292 “新人文主义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化/袁国兴
- 302 近代中国的排外运动、民族觉醒和民族主义/杨奎松
- 310 黄埔军校史的话语空间与学术魅力/曾庆榴
- 321 城市文化资源与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蒋述卓
- 336 在行走中品读岭南文化/郑通扬





大学的文化和精神

提起大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雄伟的教学大楼，先进的科学实验室，幽雅的校园小道，蓬勃孜孜的学子，渊博威严的大师；大学以现代的气息、浪漫的色彩、神秘的知识、独特的文化，令世人尊敬和向往。然而，大学不同于社会上的企业或科研机构，不仅要有大楼、有大师，还要有氛围，要有独特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

大学的文化和精神是广大师生共同营造的结果。大学的文化和精神，就是大学中的大学问。

华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华南师大）“文化素质大讲坛”以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形式，汇集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以科技前沿和社会发展的先进文化为依托，讲演人生体验和学术经验；同时，“文化素质大讲坛”吸引了校内外众多学子，其场面令人赞叹，学子如饥似渴、专心致志，其情之切，感人肺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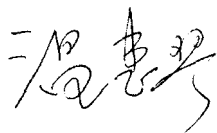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以及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大学从社会的边缘逐步走进社会的中心，并肩负起引领社会前进的责任；同时，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和期望也有所改变，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追求也在不断变化，跟上时代创新的步伐，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成为现代大学师生们的共同追求。

诚然，一个人的文化素质直接影响了其对人类、自然、民族和社会的态度、价值观和责任感，也影响了其是非标准和行为准则。大学生的成长过程可以说是大学文化的培育和大学精神的熏陶过程，而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与大学中大师的作用和影响是分不开的，尤其是高校的知名专家、教授和社会文化名人，他们积累着多年的从教经验和学术体验，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渊博的学科前沿知识，

也形成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治学精神。华南师范大学“文化素质大讲坛”不仅开拓了学生视野，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给广大学生以人生启迪，为学生树好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航标，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充实人文素养，体验科学精神，培养了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而且鼓励学生融会贯通，撰写“听讲札记”，谈他们听讲之后的触动、感悟，反刍、梳理感动之后的思考。

《大学问》一书收录了27位做客华南师范大学“文化素质大讲坛”的专家学者的演讲稿，再现了讲坛上名人、专家的风采。在这里，还珍藏着同学们在文化素质大讲坛中所受启迪的记忆和发自内心的感言。本书把大学追求真理、追求科学、追求进步，不唯上、不唯书的精神展示给大家，反映了华南师范大学严谨、创新、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校风，彰显了师者宽广深厚之襟怀以及学子好学求真之品性，体现了厚德载物、兼容并包、独立自主、无欲则刚的大学精神。

阐扬大学文化，弘扬大学精神，这是本书编者新的期待。开卷有益，但愿打开本书，会让读者有所收益。



2008年2月于广州





为学与人生





陈长琦 历史学博士，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史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出版学术著作有《两晋南朝政治史稿》、《战国秦汉六朝史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国家与政治》、合著有《北朝五史辞典》、《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等。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为学漫谈

◎陈长琦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为学，这已经是个老话题了，也是一个不好谈的问题。因为这个话题可谓“人言人殊”，一千个人有一千种谈法，各人有个人的心得体会，我想作为比你们年长一点的老学生来谈谈我的体会，与同学们共同探讨。

一、刘知几与章学诚

我想先从中国古代两位在史学上非常有名的学者开始谈起。刘知几与章学诚这两个名字大家都应该熟悉了，一个是唐代的刘知几，一个是清代的章学诚。一位的代表作是《史通》，另一位的代表作是《文史通义》，这两部在中国史学领域都是划时代的文献，所以在中国史学研究上，他们都占了一个很高的地位。刘知几和章学诚在谈学问的时候，也谈到了一些做学问的方法。

刘知几有一段著名的话，谈一个史学家应该具备的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其实不单对史学家，对文学家而言，甚至对一个科学家都是适用的。《旧唐书·刘子玄（知几）传》说：“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刘知几这里就提出了他对史学家应该具备的三个条件的看法，这里我解释一下什么是“才、学、识”。“才”现在泛指能力，一个人有办事能力，可以说有才，有艺术能力，也可以说有才，但是“才”在唐代学者口中有特定的含义，是指文学的表达能力。我举个例子：唐人所修的《晋书》，其中《庾亮传》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评价庾亮一生的功过，说他“笔敷华藻，吻纵涛波，方驾晋绅，足为翘楚，然其才高识寡，昧经邦之远图，缺安国之长算”。说庾亮文章写得非常好，诗写得非常有气势，所以“才高”；但其“识寡”是因为缺少安国、经邦的长算远图。这里谈到的“识”，就是指洞察力，判断力，就是我们常说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个人能看出别人看不出的问题，就说明这个人有卓识，看问题很准确，就说这个人有见识，这就是“识”；那么“学”，在这里则是指知识、学问。





才、学、识三者关系密切，要成就大学问，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或科学家，缺一不可。刘知几讲：“父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至于货殖者矣。”意思是说一个人光有学问、有知识，但是他不会写文章，没有用文章表达自己学问的能力，就像一个人有良田百顷，有雄厚的财力，但他不聪明，不会经营，所以他不会发财。他接着又打比喻：“夫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榱桷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意思是说一个人很会写文章，但是他没有学问、知识缺乏，就像很巧的工匠，技术像鲁班一样好，但是家里没有好的木材，没有好的工具，最终还是盖不出好的宫殿房屋来。这些是刘知几对“才、学、识”的一个解释概括，比喻很形象。然后他也谈了关于史德的问题：“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知，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夙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就是说一个好的史学家除了刚才所说的三点之外，还必须要正直，要忠实于历史，好事坏事都能够忠实的记录下来，这样他的学商就像老虎添上翅膀一样，从古到今，能够符合以上条件的人非常少，这就是文士多而史学家少的原因。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刘知几讲得对。

刘知几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严苛的史学批评家，我们从《史通》可以看出他非常严苛，他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些唐朝以前的史书都一一做了评价，并且在批评的时候言语都非常严苛，不讲情面。刘知几最看得起的就是司马迁，他认为除了司马迁之外都不算好的史学家。

第二位学者就是章学诚，清代著名的史学家。章学诚生前并不出名，是身后名，他死之后学问才被人们发现，他的学术著作才被人广为传诵，受到好评，学术地位是公认的。现在做学术史的、做史学史的学者，提起章学诚都有口皆碑。

章学诚对“才、学、识”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的《文史通义》当中有一篇《史德》，在这篇文章中他这样讲：“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意思是说这三种素质的其中一样都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在座的同学、老师，甚至是当今的史学家们，能够具备这其中一样者也很少，同时具备这三样的更是凤毛麟角。章学诚对此进行了解释：“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义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大义或真义。章学诚继续讲：“非识无以断其义”，就是说如果没有洞察力、分析能力，就没有办法判别是非；“非才无以善其文”，历史著作记录事实，要准确、完整。要将它留传下来就要靠文笔。没有写作的才能，文章就



写得不好；“非学无以练其事”，没有充分的知识和学问，就无法精练的表达事件发生的经过和过程。

章学诚还就刘知几的观点发挥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如对史德的论述。我刚才也讲了刘知几谈史德的问题，“善恶必书”，章学诚则更明确、更准确的强调史德这个概念。《史德》的开篇就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就是说具备判断能力、分析能力的人，必须要有史德，一个人的用心正不正确，是歪曲历史还是忠实于历史至为关键。

刘知几讲的才、学、识，再加上章学诚讲的史德，就构成了我们一般的共识，就是作为一个学者必须要具备的“德、才、学、识”这四个方面。我想这四个方面，其实不仅对史学家、文学家，还是科学家，都是应该具备的。

史德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优秀传统，讲史德，就是忠实历史、坚持真理、不畏强权。在古代，就有为了真理，忠于历史，不怕流血、不怕杀头的事例，这是我们学历史的应该追随的学习的榜样。我们经常谈到的春秋时晋国的太史董狐，齐国的史官太史、南史，就是我们的榜样。这两个故事分别出自《左传·宣公二年》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第一个故事讲晋太史董狐。当时晋国的政局混乱，晋灵公继位之后，非常残暴，他常在高台上用弹丸射人，以此取乐。晋灵公的暴虐引起了朝臣的不满，当时有个大臣赵盾就劝诫晋灵公要改邪归正，不要暴虐，不要射杀老百姓。晋灵公不但不听赵盾的劝诫，还多次派人刺杀赵盾。有一次晋灵公派一个武士刺杀他，那天早上赵盾很早就起床，正襟危坐在家里等着上朝，结果武士被感动了。他认为赵盾这么好的大臣，不应该去杀他，于是就自己碰到树上死了。还有一次晋灵公请赵盾去吃饭，在酒席上就放恶犬去咬赵盾，结果赵盾手下的一个武士把狗打死，救了他一命。赵盾的门人赵穿对晋灵公看不下去，就刺杀了晋灵公。当时赵盾为避免晋灵公的迫害已经逃离了国都，在晋国的边境上。而晋国的太史董狐则在晋国的史书上记载这么一笔：“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廷上公布出来。赵盾觉得委屈，说自己没有杀国君，董狐义正辞严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赵盾说：“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认为自己太冤枉了。孔子在《春秋》里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即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这个故事是说董狐秉笔直书，不怕杀头，表现了我国古代史学家的勇敢和大无畏精神。

第二个故事讲齐国的太史与南史。崔杼是齐国的一个权臣，当时齐庄公也是一个荒谬的君主，崔杼杀掉了齐庄公。齐国的太史也像晋国的太史董狐一



样，在齐国的史书上记下：“崔杼弑其君。”崔杼很愤怒，就把太史杀掉了。太史的弟弟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继续写“崔杼弑其君”，又被崔杼杀掉了，他的第二个弟弟再写，又被杀，第三个弟弟前赴后继。结果崔杼迫于压力，不敢杀了。同时齐国有一个南史，听说齐国的史官连续三个都被崔杼杀掉了，为了忠实记录历史，他没有退缩，还是执简前往，准备在简册上面继续写“崔杼弑其君”，后来听说崔杼没有再杀太史的第三个弟弟，史实已经得到忠实记载这才回去。

《左传·宣公二年》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这两个典型的、有名的事例，晋国太史董狐，还有齐国的太史四兄弟和南史，他们都是对历史有极高责任感，不怕杀头、不怕流血，坚持实事求是的记载历史的人，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要学习的。

这种精神在我国也是一直代代相传的，我国近代学者陈寅恪先生，也是一个继承中国史学优秀传统的学者，陈寅恪先生标榜的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在学术界一直是受到人们的好评。同学们可能没有关注到20世纪末以来，在学术界兴起一股陈寅恪热，为什么大家纪念陈寅恪先生呢？就是在陈寅恪先生身上寄托了我国古代优秀的史学传统。我们看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和书不算太多，他评教授的时候只有两篇论文。当时推荐陈寅恪先生做教授的是梁启超先生，清华的校长就问陈先生是哪国的博士，梁启超就说他没有学位，虽然他在国外留学多年，但是他没有拿学位；问他著作如何，梁启超就说他没有著作。当时清华研究院的负责人就说那他怎么当教授，梁启超就说陈先生一篇文章，就已经等于自己一大堆书了。陈先生虽然说文章不多，但是都是精品，更可贵的是陈先生所倡导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两句话最初是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所写的纪念碑的碑文中所表述的。我们知道王国维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私交是很好的，他们一起在清华研究院里做导师，王国维先生在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他的死因在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有人说他是“殉清”，为了清朝而自杀的，陈寅恪先生认为不是这样，陈寅恪先生在叙述完王国维先生的事迹之后，在碑文上写下了这段话，这段话是这样的：“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记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段话堪称名言，陈先生1949年到岭南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任中科院院长，邀请陈先生任中科院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派了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汪钱请陈先生回北京。后来因种种原因就没有请陈先生去。陈先生所倡导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有很深的意义，既是对中国传统史德的继承，同时也是对近代民主思想和自由思想的发扬。

二、功夫在史诗外

宋代诗人陆游，是位伟大的诗人，他写了一万多首诗，非常高产。到了晚年，他的儿子请教父亲怎样做诗，怎样写好诗，陆游告诉他：“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意思是你如果真要想学写诗，功夫不在诗的外在形式，真正的功夫在于深入社会，在于提高本人所应有的意境。我曾对历史系的同学讲，把这里改一下，将诗歌的诗改为历史的史，其实对我们学历史的也适用。要想学好历史，“功夫在史外”，功夫不仅仅在于掌握历史的知识，而应该在“识”方面花力气。我想这对其他学科例如文学的同学来讲也同样，要想写好文章，不仅在于掌握写文章的知识，重要在于文章的思想、气质。

谈到这个话题，我想起了著名的数学家、中科院院士王梓坤先生，王梓坤先生原来是南开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后来做过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1996年，在评211工程立项的时候，王先生作为评委，来过我们学校。王先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在《科学发现纵横谈》中就谈到我刚才所说的刘知几关于才、学、识的问题。王先生的知识面很广，他是一个数学家，但他的文笔非常好。《科学发现纵横谈》实质上是一本科学发现简史，大概有七八万字，让他的成名的可能就是这本小册子。在当时那个知识饥渴，没有书读的时候，读到王先生的《科学发现纵横谈》，给我心灵很大的震撼，给我的影响非常深。王先生谈到了“才、学、识”时，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三者之中“识”最重要，应该把识放在第一位，顺序应为“识、才、学”。他认为“识”对科学家是至关重要的。他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没有“识”，就不可能有成就。王先生的话给我很深的启迪，我想，在“才、学、识”三方面，确实应该着重加强“识”的提高。

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郭沫若先生，他应该是我国近代最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郭先生还有很多很多头衔，但郭沫若先生非常钟爱史学家的头衔，他在担任中科院院长的时候，还要兼任历史研究所的所长。我们看郭沫若先生在史学、文学、考古方面都很有成就。为什么？因为郭沫若先生有“识”，他的洞察力、判断力、分析能力要比别人高出一筹。我们知道，郭沫若先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构造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人。但他的知识、“学”的方面并不是非常扎实，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在史学界很多人提起郭沫若都摇头，他的文章漏洞百出，这个时代搞错了、那个结论不准确。虽然有很多批评郭沫若的人，但是郭沫若在史学、在文学领域的地位，是没有人能取代的，不管怎样，他都是第一个。千百年来，





中国历史都没有人去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他是第一个。为什么他有这个识呢，就是因为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所以他就有这样的成就。像我们研究考古学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尚书》、《诗经》以及《史记》等二十四史，翻了一遍又一遍，没有人能提出中国社会可以这样划分的；青铜器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有人说它反映了什么文化。郭沫若先生看到了。他就有这样了不起的地方，所以，“识”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说的“工夫在诗外”。观察一个事物，一个人的“识”如何，就影响他对这个事物的看法。譬如说我这里有一个瓶子，大家来看，一个人从实用的角度说它是一个容器，可以装水，也可以装气体；如果是美术家来看，他可能看到的是这个图形和谐不和谐；另外一个人从化学的角度来看，他可能看到的是这个瓶子的化学结构。同一个事物，由于人们的“识”不同，不同的人看就会有不同的角度。由此看出“识”是非常重要的，同学们应该加强“识”方面的训练。有了知识的积累，再有“才”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果还有先进的理论，具有这种卓识，一定会有成果。我常给我的研究生强调：做政治史的研究，一定要懂政治学的理论，做经济史的研究，一定要懂经济学的理论；做文化史的研究，一定要懂文化学的理论。对于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同学来说，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就是必需的史学理论。

三、真积力久乃入

下面谈谈学风的问题，做学问一定不能够浮躁。荀子曾经有一句话：“真积力久乃入。”就是说做学问一直做下去，坚持不懈的用力，才能够深入学问。范文澜先生有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不管做什么学问，一定要踏踏实实的，不要贪图取巧，当然做学问可能也有一些窍门，从手段上可以有一些技巧，但是做学问一定要持久下工夫。因此我在这里用范文澜先生的这句话和同学们共勉，不要去追求浮躁的东西，要踏踏实实。

四、学不干时身更贵

《论语》：“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范氏曰：‘君子学以为己，不求人知。然没世而名不称焉，则无为善之实可知矣。’”“君子学以为己”这句话是说人们学习是为了修身，不是为了求名。汪公岩先生有两句诗：“学不干时身更贵，书期供用老弥勤”。“学不干时”就是说我们不要去随风倒，像墙头草那样，今天风刮过来了就向这边倒，风向变了就向那边倒。不要老是去



追随时代的变化，要维持我们自己的学术尊严。史学有现实性品格。著名的史学家克罗齐说：“史家对以往史实的兴趣，永远和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柯林伍德也说过：“历史就是当代史。”这话还是有争议的，但是克罗奇的话我看应该是对的，但是对当前生活的兴趣不应该变成我们通常所说的为现实服务。

王元化先生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对《文心雕龙》的研究非常有名。他对克罗奇的话的评价是这样的：“史家一旦越出了这条界限，把对当前生活的关怀变成用历史去影射现在，那么也就使历史失去了它的独立自主性。对现实的关怀是隐藏在历史研究之中的，史家本人往往无意识的。”这里王元化先生指出了一条界限：对当前生活的关怀，不能去做影射。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影射史学是非常有名的，例如批林批孔等等。在抗日战争时期，翦伯赞先生因为当时的需要，写了一些影射性的文章，后来回忆起来，他还是有点内疚，虽然是抗日的需要，但是这种做学问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就像现在胡锦涛同志提出来的建设和谐社会，有人就做文章说古代的和諧社会是怎样建设，他的史学研究不是从历史当中找出规律，而是做现实的注脚，为现实的政策找出历史依据，这样就违背了我们史学家的史德了，所以我反对狭隘的厚今薄古，今不一定都当厚，古不一定都应薄。史学有现实性品格，但是不能够狭隘的厚今薄古。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谈过这个问题，为现实服务不能把史学作为现实的婢女。其实现实是变化的，今天是现实，明天就是历史，如果一定要用历史去迎合现实，那么，你每天都要不停地去跟着变。那个历史就不是真正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史学了。历史为现实服务，应该是通过传承历史、传承文化、传承知识来实现的，而不应是为现实寻找历史的依据。我们都知道《史记》流传了千百年了，到如今还为现实服务，这种经过了千百年中华文化积淀的史学才是真正的为现实服务，不像我们今天有很多盯着政策变动来写的为现实服务的文章，今天为现实服务了，可能过了后天就不行了。就像我们有些老师笑话某些经济学家那样，前些年歌颂计划经济、批评商品经济，过几年风向变了，又去歌颂商品经济，批判计划经济，总之为了现实不断去变，文章就成了垃圾了，没用了。历史学的著作如果想永远的为现实所用，就应该像《史记》那样，要传承历史、积淀文化，才可以为不断变动的现实服务。

五、怎样读书

第五个问题谈谈读书的问题，主要有几方面。第一个建议大家学点目录学，目录学自古以来做学问的就非常重视，清代学人讲目录是“读书治学之